

名家析名著丛书

契诃夫

名作欣赏

主編 童道明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契诃夫

名作欣赏

（短篇小说）



· 名家析名著丛书 ·

契 诃 夫 名 作 欣 赏

童道明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诃夫名作欣赏/童道明主编.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5
(名家析名著丛书)

ISBN 7—80101—451—0

ISBN 7—80101—690—4

I. 契… II. 童… III. ①近代文学-文学欣赏-俄国②契诃夫,
A.-文学作品-文学欣赏 IV. I 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2571 号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民旺甲19号 100013)

河北固安印刷厂印刷

1996年10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2次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20千字

ISBN7-80101-690-4 I·96 定价: 24.00元

撰稿者名单

童道明

—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1860 年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安东排行第三。他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契诃夫的祖父是农奴。1841 年才赎身获得自由。那年，契诃夫的父亲，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已经 17 岁。巴维尔很快脱离家庭独立闯世界。先是做商店伙计，后来积攒了钱，自己开了个杂货店。但好景不长，巴维尔·叶戈罗维奇的生意每况愈下，终于于 1876 年宣告破产。为了逃避债主逼债，巴维尔·叶戈罗维奇不得不偷偷逃离塔甘罗格，只身到莫斯科谋生。随后，契诃夫的母亲和几个兄妹也搬到了莫斯科。只有安东·契诃夫一个人留在故乡，直到 1879 年秋天中学毕业。

契诃夫不喜欢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是个粗暴的人。1889 年 1 月 2 日，目睹哥哥亚历山大也在家里无缘无故大发雷霆，安东·契诃夫写了封信进行规劝，而且把父亲当年的粗暴行为作为前车之鉴向亚历山大敲起警钟：

“我请你记住，是专制和欺骗毁坏了你的母亲的青春。专制与欺骗也葬送了我们的童年，以至于一想到这些就感到恶心和可怕。

请你想想，每当父亲在饭桌上因为午餐的菜汤做得过咸而大发雷霆，或骂母亲是白痴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多么的厌恶与恐惧啊！现在父亲也不能为这一切原谅自己。”

契诃夫的父亲不仅对妻子态度粗暴，对孩子们也动辄打骂。契诃夫小的时候，在父亲逼迫下，不时地到杂货店去站柜台，或是到教堂里去做礼拜。到了上学的年岁，专断的父亲坚持把7岁的安东和哥哥尼古拉送到一所希腊语学校，因为在这所学校可以学习商业用语。但安东·契诃夫对希腊文中的商业用语全然没有兴趣。到了第二年秋天，小安东才得以转学到俄语学校上课。

1876年契诃夫一家迁居莫斯科后，安东独自一人留在塔甘罗格念书。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委曲求全地栖身在旧居的新主人的屋檐下，为了贴补食宿费用，他也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去当家庭教师。契诃夫是在困苦与屈辱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的。或者说，契诃夫日后取得的一切成功，都是他付出了比常人更大的代价获得的。

1889年1月7日，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安东·契诃夫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突然大发感慨道：“出身贵族的作家可以不费力气得到的东西，平民百姓需要以青春作代价方可获得。不妨去写写一个青年人的故事，他是农奴的后代，站过店铺柜台，进过教堂唱诗班，后来他上了中学和大学。他从小受的教育是服从长官，亲吻神甫的手，崇拜别人的思想，为得到的每一小块面包道谢，他常常挨打，外出教书没有套鞋可穿……您写写他吧，写写这个青年人是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的，他又是如何在一个美妙的早上突然醒来并感觉到，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血。”

种种迹象表明，安东·契诃夫在这里所说的“青年人”，也有他自己的身影。

二

契诃夫的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1880年，那是他考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不久。有一个这样的传说：契诃夫第一次投稿是为了好用稿费给母亲买生日蛋糕。这传说的可信性如何，可以存疑。但契诃夫非常孝敬慈祥的母亲却是实情。

契诃夫的处女作叫《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发表在幽默杂志《蜻蜓》1880年第10期上，同期杂志还刊登了契诃夫的另一篇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两个短篇都在幽默中包藏着讽刺。前者嘲讽一个自以为很有学问实际上头脑冬烘的土地主，后者嘲笑当时文学创作中陈陈相因的公式化套子。契诃夫发表这些作品都没有用真名，前者署名“——夫”，后者署名“安东沙”。后来还用过“没有脾脏的人”、“兄弟的兄弟”一类的笔名，但在1880—1886年之间笔名用得最多的是“安东沙·契洪特”。这个笔名有点来历。契诃夫上中学时，一位语文教员发现了契诃夫的幽默的才华，便给他起了“契洪特”这么个有点滑稽味道的绰号。后来文学研究界把契诃夫的早期文学创作也称作“安东沙·契洪特时期”。

“安东沙·契洪特时期”的幽默小品，如果包括一两句话在内的“词配画”，作品数量是十分惊人的。光1883年一年，契诃夫就有120篇作品问世，其中85篇发表在由列依金主持的《花絮》杂志上。

列依金是19世纪70—80年代一位非常活跃的幽默作家与出版家。他把契诃夫吸引来成为《花絮》的撰稿人，自然也说明了他的眼力不凡。而契诃夫为了适应《花絮》的约稿需求，也练得了写短篇幽默小品的非凡能力。列依金给契诃夫提出的要求很明确。一要简短，每篇不得超过100句；二要幽默，每篇都得让读

者开怀发笑。这样就使得契诃夫的文学创作从幽默开始，以简洁为特征。此后，契诃夫把他的幽默深蕴了，把简洁的风格发扬光大了。后来契诃夫成了著名作家，列依金曾夸口说“我发现了契诃夫”。这当然言过其实了。但列依金和《花絮》杂志对于契诃夫的成长的确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887年12月27日，契诃夫给列依金写信说：“《花絮》是我的圣水盆，而您是我的教父。”

安东沙·契洪特时期的大多数作品是作者编撰笑话、应付投稿的急就章，但其中也有一些作品闪耀着不朽杰作的光芒，显示着契诃夫幽默的深刻内涵。

像《意见簿》开头的一小段幽默“前言”就耐人寻味——“它，那簿子，放在火车站上专为它设置的写字台抽屉里。写字台抽屉的钥匙‘由车站宪兵妥为保管’，其实钥匙根本用不着，因为写字台抽屉永远开着。”

据此我们不妨作一番这样的推理：火车站站长有一天心血来潮地想作点“民主”姿态，专设“意见簿”一册，恳请过往旅客提出“宝贵意见”，但又心怀叵测地将这“民主”的象征锁进了抽屉，而且把钥匙交由最不民主的宪兵“妥为保管”。旅客们最不愿意与宪兵打交道，便自己动手，拧掉铁锁，取出“意见簿”。而铁锁拧开之后，车站头头也熟视无睹，所以尽管钥匙“由车站宪兵妥为保管”的告示照样贴着，但“其实钥匙根本用不着，因为写字台抽屉永远开着。”

短短几句幽默文字，凝聚着多少社会内容！在契诃夫的幽默背后，站着一个冷眼观察世界、揭露社会病象的智者契诃夫。

冷眼观察世界、揭露社会病象的契诃夫，同时也是热心拥抱世界、充满人道精神的善人契诃夫。他早期创作的名篇，如《一个文官之死》（1883）、《胖子和瘦子》（1883）、《变色龙》（1884）等，在抨击社会庸人心理与产生庸人心理的沙俄社会的同时，也

热烈呼唤着没有经过歪曲的人性的张扬。

这种人性首先是人的尊严。早在契诃夫发表头一篇作品之前的1879年4月初，契诃夫就在给弟弟米哈依尔的一封信中，申述他的维护人的尊严的人生理想：“在人群面前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而10年之后，契诃夫又发出了人应该“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的呼吁。“一个文官”在一位将军面前的恐惧，一个“瘦子”在一个“胖子”面前的谄媚，一个警官在一头小狗面前的出乖露丑，都丢掉了“人的尊严”，暴露了“身上的奴性”。契诃夫在《一个文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中通过对于人身上的“奴性”的入木三分的揭露，张扬的正是排除人的“奴性”、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理想。

安东沙·契洪特时期佳作的一大艺术特色是高度的简洁。一篇内涵深刻的幽默小说字数往往不过一千。为了达到这样高度的凝练简洁，契诃夫通常运用开门见山的笔法。

像《胖子和瘦子》的开头是这样的——

“尼古拉铁路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相遇：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

一开头就把故事的地点——“尼古拉铁路一个火车站上”和人物——“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亮了出来。

像《站长》(1883)的开头一段是这样的——

“德烈别兹加火车站的站长名叫斯捷潘·斯捷潘内奇，姓谢普土诺夫。在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他出了点小小的岔子。这个岔子虽然分明微不足道，然而他付出的代价却是很高的。由于这个岔子，他失去了新制帽，也失去了对人类的信心。”

头一句话便轻轻地就把故事主人公的姓名与职务介绍出来。接着发了一番像是“自相矛盾”的议论：站长出了点“小小的”岔子，失去的却是“大大的”——“对人类的信心”。包括把世俗的

“新制帽”与崇高的“人类的信心”并列在一起让站长一鼓脑儿“失去”，都是契诃夫的内涵深蕴、以一当十的幽默笔法。

达到“简洁”的另一个手段是，尽可能不在人物的外形描写上浪费笔墨。如在《一个文官的死》中，契诃夫完全没有对小文官切尔维亚科夫作外部形象的描写。切尔维亚科夫的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小人物性格，以及他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状态，是通过人物本人的性格化动止加以展示的。当我们读到被将军撵出门去的切尔维亚科夫“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慢腾腾地走着”的时候，我们也预见到这个文官的“死”期已经不远。

1883年是契诃夫佳作迭出、创作丰收的一年。也是在这一年，契诃夫头一次萌生了编选作品选集的念头，但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没有成功。1884年契诃夫终于出了一本薄薄的小小说集，收入6篇反映剧院生活的短篇小说，取名《梅尔波梅尼的故事》。契诃夫为这本只有96页的小书也登载了一则广告。广告词是这样的：

“安东沙·契洪特，《梅尔波梅尼的故事》，书价60戈比，书商折扣优待，朋友免费赠阅。”

就是这小小的广告词，也透着契诃夫式的幽默。

三

1886年是契诃夫文字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年他的一个比较像样的作品选《形形色色的故事》问世。而这个作品集的出版引出了年高德劭的老作家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的一封对契诃夫产生不小影响的著名书信。

格里戈罗维奇给契诃夫的信写于1886年3月25日。信中写道：“近日听说您将有小说集问世，如果它还将以契洪特的笔名付印，那么我坚请您给出版人发份电报，让他务必在书的封面上署

上您的真姓大名。”格里戈罗维奇在信中肯定地指出，契诃夫已经是“新一辈作家中的佼佼者”，但同时也希望他爱惜自己的才华，不要急于成篇、一挥而就，而是“在内心感应充实的幸福时刻”写作经过“深思熟虑”的作品。

格里戈罗维奇的信使契诃夫深受鼓舞。3月28日契诃夫立即写了一封回信。表达了自己的难以掩饰的激动。契诃夫坦诚地告诉这位文学的长者说：“在莫斯科我有上百个熟人，其中有20个耍笔杆子的，但我说不出他们中有谁读过我的作品或是把我当作一个艺术家看待。”契诃夫承认自己写作过于匆忙，“记不得有哪一个短篇小说的写作时间超过一昼夜的”。契诃夫最后在信中写道：“寄一切希望于未来。我今年才26岁。也许，我还能有所作为，尽管时间过得飞快。”

契诃夫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寄希望于未来”的。其实早在1886年年初，契诃夫就已经以新的姿态出现于俄国文坛。一反先前的幽默小品样式，契诃夫发表了一篇题名《苦恼》的小说，尽管这篇作品还是署名安东沙·契洪特，但《苦恼》的出现实际上是作者从契洪特转变成契诃夫的关键之作。

《苦恼》写一个名叫姚纳的马车夫想把刚刚死去儿子的“苦恼”向人诉说，但一连四次均遭失败，最后他不得不把这“苦恼”说给那匹小母马听。小说最后这样作结：“小母马嚼着草，听着，对它主人的手喷气。……姚纳讲得着了迷，把心里的话统统都对它讲出来。”这个结尾意味深长。

契诃夫在这篇小说中通过对一个马车夫的“苦恼”的描述，对人类的苦恼作了深层次的开掘。他把“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作小说题辞，也是有意借助这句话出自《旧约全书》的哀叹，把读者的思绪引向对人生困顿的更为概括的思考。

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苦恼》对这个问题的阐发是基于小

说人物姚纳的视点与小说作者契诃夫的视点的交叉。

这两个视点是不能重合的。对于姚纳来说，儿子去世是苦恼，他的丧子之痛无人理会是苦恼，但更现实的苦恼是——拉了一天马车“连买燕麦的钱都还没挣出来，”他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苦恼的缘故了……”

契诃夫的视点高于具体的“燕麦”之上。他在《苦恼》中始终在引导读者看到在茫茫人海中的一个孤独者的身影。小说在写到三个夜游的青年人冷漠地撇下姚纳之后，作了如下一段苦涩至极的叙述：“姚纳的眼睛焦灼痛苦地打量着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那成千上万的人当中连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都没有吗？然而人群在奔跑，既没注意到他，也没注意到他的苦恼。……”

《苦恼》写的是人的孤独和人与人的隔膜。契诃夫像是在提醒读者：人生的最大苦恼与其说是在于人人皆有苦恼，毋宁说是在于人不愿意理会别人的苦恼。

后来，人的隔膜、孤独成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重要主题。追根溯源，我们发现《苦恼》正是这一主题的源头之一。契诃夫主要是在19世纪末叶进行创作的作家，但他是一位为20世纪文学奠基的作家。能够作此结论的第一个有力证据就是《苦恼》。

但俄国文学史家们更愿意把18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草原》视为契诃夫创作的里程碑。这也是有道理的。

《草原》是契诃夫第一次下了大力气写出来的作品，它的篇幅的规模也是空前的。写完《草原》，契诃夫于1888年2月22日的一封信中说，“《草原》消耗了我那么多的精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不会再写什么有分量的东西了。”

《草原》的确是一篇很有分量的作品。契诃夫本人也很看重它。1888年2月5日契诃夫致函恩师格里戈罗维奇说：“我知道，果戈理在那个世界上会生我气的。在我们的文学中他是草原之王。我

怀着善意闯入了他的领地。”在这之前的1888年1月12日，契诃夫已经写信给格里戈罗维奇谈过他的《草原》，而且同样是不无自豪地写道：“也许，它（《草原》）会打开我的同龄人的眼睛，向他们展示还有多少宝藏与美景有待开发，俄国的艺术家还有施展身手的天地。如果我的这个中篇小说能够让我的同行们重新记住已经被人遗忘的草原，如果在我们的描述中哪怕有一点可以为某个文人雅士提供凝神沉思的机会，那我就满足了。”

在上文已经说过，契诃夫早期的幽默小品一般避免景物描写。但在《草原》里关于草原景色的成段描写就有七处之多。其中第四段对于草原晚景的描写已经涉及到整个小说的思想意蕴——

“于是，在唧唧的虫声中，在可疑的人影上，在古墓里，在蔚蓝的天空中，在月光里，在夜鸟的飞翔中，在你看见而且听见的一切东西里，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求生的热望；灵魂响应着可爱而庄严的故土的呼唤，一心想随着夜鸟一块儿在草原上空翱翔。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紧张和愁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在这欢乐的闹声中，人听见草原悲凉而无望地呼喊：歌手啊！歌手啊！”

草原的美无人欣赏，无人歌唱，因此草原“孤独”，知道自己的美丽与财富“白白荒废了”。这是草原的悲剧，也是人的悲剧。因为被商业利益驱动的人、被生活重担压迫着的人都忘记了草原的美丽。契诃夫关注着人与自然的这两种力量的矛盾，但心里向往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矛盾之中的和谐，后来也成了20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1888年年初契诃夫写完《草原》之后足足过了半年多，又构思创作了另一部严肃的力作《神经错乱》。小说写一个名叫瓦西里

耶夫的法医学系学生跟着两个朋友到一条妓院街目睹了人间地狱之后的痛苦感受。当瓦西里耶夫走出这个人欲横流的所在，天空正飘着雪花。“在瓦西里耶夫的四周，细雪成团的旋转，落在他的胡子上，眉毛上，睫毛上……马车夫、马、行人全变白了。”

有人读了《神经错乱》后，觉得作品的色调过于灰暗，契诃夫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小说中也有沁人心肺的亮色，那就是“在瓦西里耶夫的四周”成团旋转，“让马车夫、马、行人全变白了”的雪片。

误读的情形也出现在另一篇严肃的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在1889年秋天发表之后。

契诃夫以29岁的年龄用第一称的口吻描摹一位行将就木的老教授的复杂心态。这位名叫尼古拉·斯捷潘内奇的老教授一生献身科学，但临到垂暮之年却悲观地承认：“不管我怎样费力地想，也不管我把思路引到什么地方去，我清楚地觉得我的欲望里缺乏一种主要的、一种非常重大的东西。”有人试图把老教授的思想看成是契诃夫本人的思想。这引起了契诃夫的抗议。他在一封写于1889年10月17日的书信中声明：“如果给您一杯咖啡，那么不要从中寻找啤酒。如果我给您提供教授的思想，那么不要从中寻找契诃夫的思想。”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没有意思的故事》中感受到契诃夫本人探究人生真谛的渴望。这肯定也是促成契诃夫的库页岛之行的原因之一。

四

契诃夫与鲁迅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学医出身，后来又都转为从事文学创作，成就为举世闻名的大作家，最后也都死于肺结核。

契诃夫的咳血史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在 80 年代末写给苏沃林的一封信中，才较为详细地陈述了他的病状：“每到冬、秋、春三季，以及夏季的阴雨天，我都要咳嗽。但只有当我见到吐血的时候，我才担心：口中流出来的血总是不祥之兆。”但他同时否认自己得了肺结核，他的理由是：“如果我 3 年前那次咳血是早期肺结核的症状，那我就早到了另一个世界去了——这就是我的逻辑。”

这显然是个自我安慰、自我麻痹的逻辑。但将自己的病症“大事化小”，也有要宽慰亲朋好友，特别是宽慰年迈老母的苦衷。而从另一个角度说，他心存侥幸也是因为心怀大志。80 年代末，当他力图“说服”自己和别人相信他并非是肺结核患者的时候，他正在酝酿做一件大事——只身考察库页岛。

契诃夫为什么突然想起去几千公里以外的库页岛？他自己是这样来说明非去不可的理由的：“这次旅行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是小俄罗斯人，已经懒散得可以，应该锻炼锻炼自己……就算这次旅行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但难道不会在整个旅行中出现能使我日后带着狂喜或是巨痛回忆上一辈子的三两天？”（1890 年 3 月 9 日致苏沃林信）

也有研究者认为，促成契诃夫库页岛之行的重要因素，是他哥哥尼古拉的不幸去世。画家尼古拉是契诃夫最为亲近的家庭成员，1889 年 6 月死于肺结核。尼古拉之死对契诃夫的打击很大，这可以从他 1889 年 6 月 26 日的一封信中看出这一打击的严重程度：“我这一生决不会忘记泥泞的道路、灰色的天空、树枝上的泪水。我所以决不会忘记这些，是因为早上从米尔哥洛特来了一个农民，他带来了一份湿润的电报：‘尼古拉病逝’。”

可以认为，“库页岛之行”是契诃夫早就在心中筹划好的“人生旅程”，哥哥尼古拉的去世只是促使他立即把这计划付诸实现，为的是尽快改变一下他已经难以忍受的生活环境。

1890年4月20日，契诃夫告别家人，踏上了奔赴库页岛的漫长旅程。经过一个多月的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契诃夫终于在1890年6月20日到达贝加尔湖畔。当他坐在《叶尔马克号》轮船头等舱里饱览阿穆尔河（黑龙江）两岸的奇异景色时，没有忘记用书信让老友分享他在完成最后一段水上航程时的欢愉：

“这就是阿穆尔河。悬崖、峭壁、森林，无数的野鸭以及各式各样叫不出名来的长喙的精灵。荒无人烟。左岸是俄国，右岸是中国。中国与俄国一样是片蛮荒的土地，难得见到一个村落……我在阿穆尔河漂流1000多俄里了，欣赏到了如此多的美景，得到了如此多的享受，即使现在死去我也不觉得可怕了。”

契诃夫于1890年7月11日到达库页岛。在库页岛上的考察工作十分艰辛。每天5点起床，有时一直工作到深夜。契诃夫走遍了所有的居民点，和每一个拘留在岛上的苦役犯进行了交谈。流放到此地的苦役犯人的悲惨命运，使契诃夫仿佛置身于一个人间地狱之中。

契诃夫在库页岛逗留了3个月零两天后，于1890年10月13日乘海轮踏上了途经印度、新加坡、锡兰的归程。1890年12月1日契诃夫搭乘的《彼得堡》号海轮抵达敖德萨港，12月8日回到了莫斯科。12月17日契诃夫给一位曾经反对他进行这次冒险旅行的朋友说：“您当初劝阻我去库页岛，您可是大错特错了！”他认为此行收获很大。

契诃夫从库页岛回来之后写出的第一篇小说是《决斗》。小说结尾处，小说主人公的内心独白阐述了这样一个人生哲理：“寻求真理的时候，人也是进两步，退一步。痛苦啦，错误啦，对生活的厌倦啦会把他们抛回来，可是寻求真理的热望和固执的毅力推动着他们前进。谁知道呢？也许，人终于会达到真正的真理……”